

文化遺產與認同建構：臺北與香港的殖民地景保存

顏亮一 *

* 輔仁大學景觀設計學系副教授

摘要

許多城市研究者都指出，歷史保存對當代城市而言，是一種塑造獨特地方意象以吸引觀光客或商業投資的手段。然而對於曾身為殖民地的東亞城市來說，只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來看歷史保存，可能會忽略歷史性地景在政治與文化向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以台北與香港的殖民地景保存為對象，試圖理解歷史保存在認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對台北的「首都核心區」、「府前廣場改造計畫」、樂生院保存運動，以及香港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屏山文物徑、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等個案進行分析之後，本文發現，台北與香港殖民地景的詮釋與再現，與不同社會行動者身分認同建構的計劃相關。其中，由國家啟動的殖民地景保存方案，傾向於營造一種有助於維持統治正當性民族記憶場所；相對地，因為抵擋都市再開發而形成的殖民地景保存運動，則營造出一種關乎公民參與、人權與正義等集體認同的社會記憶場所。在一個去疆域化的世界裡，這兩種歷史保存計劃都可視為不同社會行動者再疆域化的策略，也恆常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關鍵字：歷史保存(育)、文化地景、認同政治、後殖民主義、全球化、台北、香港

Representing Colonial Landscape: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Taipei and Hong Kong

Abstract

Many urban researchers have maintained that historic preservation is a strategy for contemporary cities to shape unique place image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attracting tourists or business investments. To East-Asian cities with colonial history, however, viewing historic preservation solely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may overlook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historical landscape. For this reaso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reservation of colonial landscape in Taipei and Hong Kong,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in identity politics.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Capital Core District”, “Capital Plaza Redesign”, Leseng and Sanatorium preservation movement in Taipei, and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Pinsang Historical Trail, and preservation movement of Star Ferry Pier and Queen Pier in Hong Kong,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colonial landscape in Taipei and Hong Kong is related to the identity building project initiated by various social actors. The coloni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programs led by the state tend to make places of national memory, which can strengthen the legitimacy of the ruling power; in contrast, the colonial landscape preservation movements triggered by resisting urban redevelopment tend to make places of social memory, which can enhance collective identit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In a world of de-territorialization, both historic preservation projects can be considered as strategies of re-territorialization for various social actors, and the tension between them will exist perpetually.

Keywords: historic preservation, cultural landscape, identity politics, post-colonialism, globalization, Taipei, Hong Kong

前言

美國文化地理學家 J.B. Jackson 曾指出，在早期歷史性地景保存的目的並非為了取悅大眾，而是要提醒人們對其所屬社群在政治上或宗教上的責任，並建立共享的身分認同；但是於二十世紀下半葉興起的歷史保存(historic preservation)熱潮則不然，歷史性地景失去了政治或宗教意義，它所指涉只是一個面目模糊的過往，一個失落的美好時光，它呈現的只不過是「一段沒有事件的時間，以及一種沒有紀念碑的地景」(Jackson, 1980: 98)。的確，許多城市研究者都指出，歷史保存對當代城市的重要性，主要在於藉之塑造城市的形象，提昇城市競爭力，以便在全球市場中吸引外資的投入與觀光客的造訪(Boyer, 1995; Harvey, 2001; Short, 1999; Urry, 1990; Zukin, 1995)。歷史性地景保存的政治或宗教意涵於焉消融在商業化與商品化的洪流之中，並弔詭地成為城市面對全球經濟競爭下，建立城市識別的一種手段。如果對既有地景進行「創造性的摧毀」是資本進行積累的必然過程(Harvey, 1982)，那麼在今天的城市中資本摧毀可能不是歷史性地景的形式，而是它們的社會意義。

上述理論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歷史保存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興起的原因，然而這種說法基本上產生自對西方資本主義城市的觀察，未必適用於非西方的城市。尤其當我們考慮到當今全球化並非憑空生成，而是有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時，我們更需謹慎地對待歷史地景保存的現象。誠如 Anthony King (1990) 所主張，雖然全球化的意識是在 1980 年代才出現的，但是全球化的現象至少已經存在了兩百年，伴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海外的殖民的開展，當年的殖民城市，更可說是現今所謂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先驅。因此，對於非西方城市歷史保存興起的現象，恐怕還得將其作為殖民城市的過往考慮進去，而不能只從城市經濟競爭的角度來理解。正是在這個前提下，本文將以台北與香港這兩個東亞的世界城市為對象，進行跨區域的比較，以理解殖民地景作為一種文化素材，在當代後殖民城市都市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選擇台北與香港作為研究個案，是因為它們具有下述共同特質：首先，兩者都是以華人人口為主的移民城市；其次，兩者都在當代東亞區域經濟中扮演主要的經濟網絡節點；三，兩個城市都有長期被殖民的經驗，而且都在二十世紀末才進入某種後殖民的狀態；第四，兩地不論是官方或民間，皆於其後殖民時期，開始重視城市歷史性地景的保護。在此本文有必要就何謂台北或香港的「後殖民」稍作說明。如果後殖民指的是在時間上帝國主義殖民政權的退出，那台北在 1945 年就已經進入了後殖民時期。然而若

考慮到前殖民地人民在殖民宗主國離開之後是否在經濟、政治與文化各方面有自我掌控的權力，那台北在 1987 年解嚴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之下則仍處於一種內部殖民的狀態，而到了解嚴之後才得到了政治民主，並釋放了過去四十年對自我身分定位的壓抑（邱貴芬，1995；陳芳明，2000；廖炳惠，2000）。至於香港，由於伴隨著英國殖民結束而來的並非港人完全的自治，而是中共所宣稱的「一國兩制」，因而從 1984 年《中英合聯聲明》發表後，身分的定位在香港開始成為一個公共政治議題（陳清僑，1995；陳清僑，1997；羅永生，1997）。因此，本文的「後殖民」所指的，與其說是殖民政權的結束，毋寧說是過往殖民主義所帶來的歷史與地理條件，在此條件下諸社會行動者得以建構新的身分認同，以之作為行動意義的來源。

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為：在全球化與後殖民的脈絡下，台北與香港的不同社會行動者如何藉由詮釋與再現殖民地景，以支持某種身分認同論述的建構？在後文中，本文首先將探討文化地景、集體想像、與身分認同等幾個概念，並據以擬定一個分析的提綱；其次，本文將從殖民歷程的考察，分析台北與香港與世界經濟的關係；本文的三和第四部份將分別針對台北與香港選擇具代性的歷史保存個案，檢驗兩地的國家以及社會運動如何藉由殖民地景的再現來建構身分認同；在第五部份，本文將比較台港兩地歷史保存政治的異同，並探討造成這些異同的主要原因；最後，本文將討論研究結果對歷史保存理論與實踐的意涵。

地景、集體想像、與身分認同

要對台北與香港的歷史保存政治進行比較分析，本文首先要建立一個可供檢測的理論架構。根據顏亮一（2005）對當代歷史保存運動的考察，歷史保存在資本主義現代性全球擴展的過程中扮演了三種不同的角色：首先，歷史保存和民族主義相關，它被用來再現民族國家的歷史、建立國家認同，進而創造出「無性別、種族、階級或區域認同（之分）的想像公民」（Boyer, 1994: 378-379）；其次，歷史保存和在地主義相關，它被用來再現小尺度的地方集體記憶，並常和社區培力連繫在一起，在此，它是一種在地主義；最後，歷史保存和消費主義相關，歷史地景成為「後現代」社會中的一種奇觀，記憶的再現成為一種消費商品。事實上，我們或可由此引申，不管歷史保存和現代性之間的接合是建立在民族主義、在地主義或是消費主義之上，它都不外乎是一種藉由再現地景以創造集體想像的過程，這種影像是身分認同建構的重要素材。在本文的脈絡中：地景、想像、與認同乃是關鍵字眼，因此讓我們針對這三個概念稍作探討。

地景的英文 landscape 這個字眼具有兩種相關但又不同的意義，一方面，它所指的是客觀的、視覺可見的「地面景物」；另一方面，它又意圖了人們用什麼主觀的方式來「看」這些景物。因此，包含我們眼中所見的風景、畫家描繪的風景畫、以及被觀看、被描繪的對象本身都被稱為 landscape。¹由於地景這個詞的多重語義，因此英語世界中不同學者強調與著重的內容也不盡相同。²本文大體上同意 Daniel Cosgrove(1998) 的看法，視地景為一種結合實體形式與觀看方式的意識形態。Cosgrove 研究地景觀念在西方歷史的演變，指出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土地從人賴以為生的場域被轉變成一種可以被擁有、被管理以及被觀看的財產，而風景畫 (landscape painting) 這種特定的繪畫形式在十七世紀的興起正是資本階級操弄觀看土地方式，自然化新社會關係的一種手段。換言之，觀看土地的視角本身便蘊涵了權力與支配的關係。另一方面，James Duncan(1990) 也提出，地景中所有的可見人造物都是一種具體化的意識形態，因為它是設計者運用語言與知識框架所書寫出來具有教誨意義的可見載體；這些教誨融入在地景中，讓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將其視為理所當然的一部分，進而生產自身的行為。

在上述地景理論的脈絡下，研究地景的目的就是要檢驗物質環境背後的觀念以及其藉由什麼方式被再現。正如 King(1996) 所指出，地景其實是透過三個層次的再現以達成意識形態自然化的效果。第一個層次是物質空間形式本身，它不但再現、也構成了特定的社會關係；第二個層次是它的視覺再現，這個層次是一個符號學的領域，地景的視覺符徵指涉了某些符旨；第三個再現的層次則是關於地景的語言或文本論述，但是這個論述的再現，必然要建立在空間層次與符號層次的再現之上。換言之，地景意識形態的作用，乃是同時藉由空間、符號以及論述編織出來的。但是，我也要注意，即使地景在多重層次上再現某類意識形態，人們仍能藉由不同的空間實踐來協商或調整地景的意義 (de Certeau, 1984)。

¹ 在中文裡 landscape 有時被翻譯成「景觀」，有時候被翻譯成「地景」，本文統一使用後者，因為它比較能包含英文中 landscape 同時作為被看對象與看的方法的兩個意思。

² 根據 George Henderson(2003) 的耙梳，landscape 這個字眼在地理學界有四種不同的論述：第一種用法是取用德語 landschaft 的觀念，將地景視為「社區與土地之間的交互束縛」，特別指的是穩定的鄉村地景，強調的是鄉土的情感與價值。第二種用法則是將地景視為社會空間 (social space)，地景指不是某種社會關係下的產物，而是任何人類居住的場所。第三種用法視地景為一種知識論的地景 (epistemological landscape)，強調由於地景是人類活動與信念的物質性記錄，因此對地景的解讀乃是了解社會不可或缺的一環。至於第四種用法則和第三種相反，地景在此不再是揭露社會事實的證物，反而是遮蔽社會事實的謊言，因此被 Henddrson 稱為偽撰地景 (apocryphal landscape)。本文對地景的用法接近第四種用法。

正因地景可作為意識形態教化的工具，因此傳統文化地景再現，往往成為現代民族國家書寫民族歷史、形塑民族情感與民族認同的場域。Eric Hobsbawn 與 Terence O. Ranger (1983, 引自 Boyer, 1994: 310) 曾斷言，所謂的傳統其實都是被「發明」出來的，其目的不外乎建立群體的社會凝聚力、對社會成員灌輸特定的價值與信念、以及正當化或建立國家的主權。平行於「發明的傳統」，民族國家也發展出「發明的地景」(Boyer, 1994; AlSayyad, 2004)，這種地景要能夠同時在空間、符號與論述上再現民族國家的歷史、喚起人民同屬於一個想像社群的情感、以及創造人民的身分認同。然而，隨著二十世紀後半葉大規模的經濟全球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口與文化流動，國家(state)、民族(nation)與場所(place)這組建構現代民族國家的想像關係開始受到挑戰。同樣地，這種發明的地景也逐漸失去精準再現現實社會關係的力量。

論及當今的全球化的現象，Arjun Appadurai (1996) 提出想像(imagination)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重要性。³對 Appadurai 而言，想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關乎了個人或集體如何理解自身在全球的處境，進而採取策略與行動。在過去兩個世紀中，民族國家乃是這種想像的主導形式，但是在二十世紀末，由於文化的全球流動散裂成族群景觀(ethnoscape)、科技景觀(technoscape)、金融景觀(financescape)、媒體景觀(mediascape)、觀念景觀(ideoscape)等五個相關卻不平行的面向，並造成了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普遍現象，因此民族國家的想像是否仍為(或應為)一種主導形式則值得商榷。和本文特別相關的是他用了景觀(-scape)這個後綴詞自創了上述的概念來描述全球化的現象，這一方面指出這地景不規則的形貌，另一方面則指出「它們並非客觀的、從任何角度看都一樣的既定關係，而是深受觀點而異的建構物，因不同行動者的歷史、語言與政治處境而異，這些行動者包括：民族至國家、多國組織、離散社群、次民族團體與運動(無論是宗教性、政治性、或經濟性)，甚至面對面的親密團體，像是村落、鄰里、與家庭」(Appadurai, 1996: 33)。Appadurai 運用了景觀這後綴詞，一方面既是一種隱喻性的空間關係，也是一種實際上的區位關係。前文討論地景的字義時曾論及地景既是被看之物，也是觀看方式，在 Appadurai 的擴充之下，我們或可主張作為意識形態的地景，也是全球

³ 在 Appadurai 的用法中，想像這個概念乃結合了法蘭克福學派所說機械生產的影像(image)、Benedict Anderson 所說的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以及法國涂爾幹學派的想像體(imaginary, imaginaire, 意指集體熱望所建構的地景)。

化文化經濟散裂下的一種想像；換句話說，在當今的時勢之下，地景如何被再現、解讀與使用，可能都和社會行動者的設身處地有關。

將文化地景保存（或者更特定的殖民地景保存）重置於上述的理論脈絡下，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化地景、資本流動、民族至國家的認同、以及其他認同建構之間複雜的關係，也讓我們看到更多抵抗的機會與場域。首先，就金融景觀的角度觀之，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在近年來已從凱因斯式的福利國家轉變成熊彼得式的企業國家 (Jessop 2002/2008)。而在地方的層次，城市的治理則逐漸由管理主義轉向企業主義 (Harvey, 2001a)，因此形成城市或區域之間在經濟上的競爭關係。Harvey(2001b) 以「壟斷的地租」這個概念來說明資本如何挖掘地方的獨特性，創造可商品化的城市意象（當然是一種想像），文化（我們可以加上文化地景）成為一種集體象徵性資本，所以也自然成為媒體景觀的一部份。然而，就族群景觀以及意識形態景觀的面向而言，文化地景的保存可能還更廣泛地與民族認同的建立或其他普世價值如民主、平等、人權、正義等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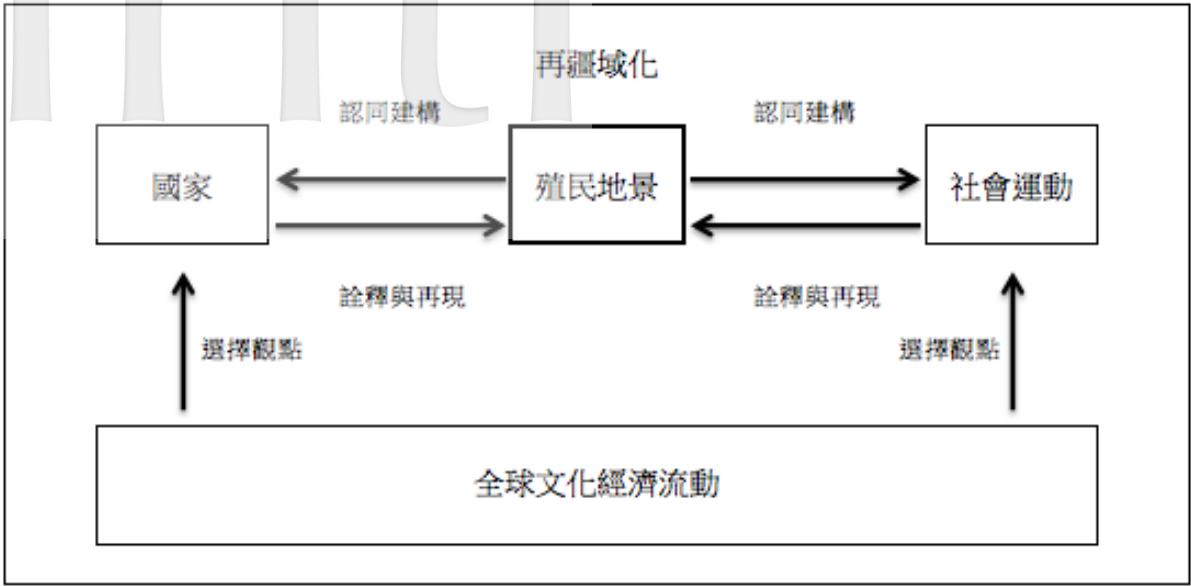
Appaduari 對於想像景觀散裂的現象有相當深刻的探討，尤對於分析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不遺餘力，但卻甚少論及同時發生的另一個重要現象：再疆域化 (reterritorialization)，也就是不同的想像景觀以什麼方式被在地的行動者重組，創造新的想像，並形成政治動員的力量。就這點而言，我們或可借助 Manuel Castells 的研究成果來給我們一些啟發。Castells 同樣認為，當今的世界已形成一種資本與資訊快速流動、經濟與軍事活動都不受個別國家控制的網絡社會 (network society)，而在其中真正的決策都在流動性空間中被擬定，民族國家或是地方政府等與特定地點、領土相關的決策機構，則逐漸失去了它們固有的主導權，「人們生活在地方，但是權力藉由流動來統治」(1989: 349)。但是 Castells 觀察到，在這種權力兩極化的網絡社會中，身分認同 (identity) 的建構成為一種抵抗的力量。無論是個人、社會群體、或社會整體都可以在其所處的社會結構與時空架構中，重組其行動的意義，建構新的認同。但是重點是「誰來建構、為何建構這種集體認同，決定了這種認同的象徵內容、以及它對認同或不認同這種身份的人所帶來的意義」(Castells, 1997: 7)。

根據上述理由，Castells 界定了三種不同的認同建立之形式與起源：正當性認同 (legitimizing identity)、抵抗性認同 (resistance identity)、以及計劃性認同 (project identity)。正當性認同指的是由統治機構（例如民族國家）所建構以合理化其統治的認同建構；抵抗性認同指的是在統治邏輯下受到壓迫的團體，為了抵抗與生存而發展出的對立性認同；而計劃性認同意指

社會行動者以其身邊可資利用的文化素材，建立可界定其社會位置之新身份認同，並藉此轉化整體社會結構。重要的是，Castells 認為民族國家以及其建立的民主制度在全球化時代大受在流動空間中運作權力的威脅，因此現代性所建立的正當性認同開始瓦解。而在此同時，以宗教、地域性、族裔、性別、環境保育、次國家的民族主義等以社群為中心所建立抵抗性認同，反而成為社會行動者意義的主要來源。儘管如此，Castells 也強調，這些社會運動雖有創造計劃性認同的潛力，但卻沒有形成計劃性認同必然性。如果它們的運動目標過於內向或者邊界過於封閉，那只會形成利益團體，對於社會整體結構性轉化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經由前文對於地景、想像、與認同三個關鍵字的理論探討，本文初擬了一個分析提綱，來協助我們理解殖民地景和後殖民都市政治的之間的關連（參見圖一）。首先，本文將殖民地景在後殖民時代的保存，視為在地社會行動者在一個去疆域化的世界中進行再疆域化的行動過程；其次，本文將研究聚焦於兩個最重要的社會行動者，亦即國家與社會運動，檢視它們在全球文化經濟流動的景觀，採取了什麼觀點，選擇了什麼素材，作為詮釋與再現殖民地景的論述基礎；第三，本文將檢驗國家與社會運動對於殖民地景的詮釋與再現，連結上哪一種身分認同建構的方案。此外，這個研究提綱也是一個參考架構，讓我們得以在同一個標準下來衡量台北與香港兩地保存政治的異同。

在這個研究提綱的指引下，本文對研究個案選擇的第一個原則是該個案是否和國家建構當性認同或社會運動建立抵抗性認同的計劃相關，其次則是該個案在多大程度上能闡明歷史保存作用於認同建構計劃的具體過程，最後是該個案是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家或社會運動對歷史地景保存的觀點。這些原則之下，在台北的國家保存方案中，本文將討論「首都核心區」以及「府前廣場改造計畫」兩個相關的空間計畫，而在台北的社會運動方面，我們選擇的樂生療養院的保存運動。至於香港的國家保存方案，本文選擇了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香港故事」以及為香港康樂與文化署所大力推廣的屏山文物徑，而在香港的社會運動方面選擇的是引起香港大眾極度關切的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的保存運動。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台北與香港兩地的殖民地景在後殖民情境的認同建構方案中，究竟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⁴



去疆域化的世界（網絡社會）

圖一：分析提綱

⁴ 至於本文在資料蒐集方面所採取的策略，則混合了一手資料的觀察分析以及二手資料的重新詮釋。「首都核心區」、「府前廣場改造計畫」主要資料來源是新聞事件的報導；「香港故事」展以及屏山文物徑的分析來自筆者實地參訪的經驗以及相關的介紹資料；樂生院、天星與皇后碼頭的資料來源則包含了新聞事件以及相關研究對事件當事人的報導；最後，本文作者曾參加了樂生院保存運動早期的階段。本文理解這樣資料蒐集與呈現方式可能會減少本文在個案分析上的深度，但是因本文無論在社會作用者的類型與地理範圍上都有一定的廣度，因此犧牲某個程度的深度恐為一種不得已的作法。

殖民全球化下的台北與香港

現今討論全球化與城市關係的文獻，主要都把重心放在 1970 年代以後，全球工業生產組織的變化及全球金融活動的鬆綁所帶來一連串政治與文化的後果。然而，正如前文所提及，全球化早在兩百年前就隨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海外殖民開展，正如 Karl Marx 與 Friedrich Engels 在《共產黨宣言》(1842 /2001: 29) 中注意到的：「為了滿足產出必須不斷擴張市場，這驅趕著資產階級奔走於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通過對於全球市場的剝削，資產階級賦予每個國家的生產和消費一種世界主義的性格」。因此，即使其範疇、規模與速度均未如今日顯著，我們仍有必要將全球化的歷史縱深拉長，以理解不同地點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特殊性，這就將我們帶到台北與香港的殖民史。

(一) 殖民主義與世界經濟脈絡下的台北

嚴格來說，荷蘭與西班牙等國在十七世紀短暫的殖民台灣，便已將台灣帶入世界經濟。⁵ 約 1670 年左右，清帝國以海防的理由，佔領台灣並正式將之納入版圖，進入了另一個殖民階段。由於清帝國自絕於世界貿易體系之外，再加上對於移民的渡臺禁令及海禁，所以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台灣都和快速發展的世界經濟體系隔絕開來，並使得這段期間台灣的經濟處於低度發展的狀態。儘管如此，來台拓墾的移民仍然逐漸由南而北，慢慢地開發台灣的糧食作物與經濟作物，除了島內的消費外，尚可以輸入中國大陸進行貿易活動。雖然北台灣的開發遠較台灣其他地區來的晚，但在 1820 年前後開放八里坌與大陸對渡之後，台北盆地內各聚落開始以新莊及艋舺兩個港埠為核心發展起來。

到了 1858 年，清帝國受迫簽訂中英、中法《天津條約》承諾開放淡水做為國際通商口岸，台北開始和世界經濟接軌，而當時新興的大稻埕乃是北台灣最重要的貿易據點。中法戰爭後，北台灣的政治與經濟地位日形重要，清政府於是在台灣建省，除了新建台北城作為北台灣的政治中心之外，

⁵ 1624 年荷蘭的半官方機構「聯合東印度公司」正式進駐今日台南的安平與赤崁，以之作為與中國及日本進行貿易的轉運站。而對島內的開發方面，則是以軍事力量控制原住民以及大陸的漢人移民，在島內生產蔗糖與鹿皮，出口至中日等海外的市場(蔡明璋，2010)。1664 年鄭成功為了「反清復明」佔領台灣以後，替代了荷蘭人掌控了台灣海峽，自行經營與日本及西洋的海上貿易，亦可視為一種殖民形式。

也致力於大稻埕商港的建設。為了吸引外資，清政府鼓勵本地商人興建洋樓出租給外國人，同時更在大稻埕設立各式現代化的都市設施，像是火車站、鐵路、電報系統等等。於是，大稻埕便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間飛快地成長為全台第二大城，同時也成為自清帝國治台後第一個與世界經濟接軌的貿易口岸。

1895 年的馬關條約將台灣從清帝國的手中轉移到日本帝國，也開始了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相較於清朝的統治，日本採取了殖民的現代性治理與數字管理，殖民政府利用土地調查、人口普查、普建教育、建立金融體制、建立交通體系等方式，奠定台灣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將台灣納入日本的經濟體系。在日治之初，總督府即確立了「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的基本經濟政策，台灣向殖民母國輸出米與糖等農產品，並從日本輸入工業產品，形成一種典型殖民依賴經濟（黃崇憲，2010:145）。1908 年縱貫線鐵路通車，更鞏固了台北的政治與經濟地位。台灣西岸生產的米、稻、煤等貨物皆由鐵路運送北上運送至港口，出口至日本，再由日本銷往全世界，形成以日本為中心加入世界市場的形態（蘇碩斌，2010：262）。然而到了 1930 年以後，由於受到日本南進政策的影響，日本對台的統治政策開始轉變，台灣不再扮演農產品供給的角色，而是被指定為軍需品的生產地及日本南進的補給站，台北和世界經濟的關係暫時中斷。

到了國民黨 1949 年撤退來台至 1960 年左右，國家以「反共復國」為名，對社會高壓統治，將一切物質投入戰爭的準備，因此這個階段的台灣進入一種內部殖民的狀態，台北再度成為一個軍事海上領土與剝削殖民的混合體。從 1951 年開始，在美援的支持下，台灣得以購買國外的先進技術與設備，發展進口替代的政策，發展工業，以支持龐大的軍需（黃崇憲，2010：148-149）。這種經濟型態一直到 1960 年代國民黨放棄「反攻大陸」之後才有了轉變。從 196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在以美國為核心的國際地理政治下，台灣接受了美國的建議，國家展開了一個自由市場與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策略（Castells, 2000; Gold, 1986）。藉由低工資、低成本與低技術層級的龐大中小企業部門生產工業，成功地使台灣成為全球經濟中製造業一個重要的生產者。中小企業作為台灣經濟活動的主力，在各地設立工廠以及勞動人力庫。而台北則在台灣經濟空間中扮演指揮中心，調節資訊與產品在國內產地與國外市場之間的循環（夏鑄九，1988）。

1987 年，國民黨政府宣佈解嚴，台灣進入了政治上的後殖民時代。但是在經濟上，由於本地工資與土地等成本的升高，再加上中國在從 1979 年開始進行的「改革開放」，台灣的資本開始大量地西移到中國大陸或者南

移到東南亞國家。面對這個經濟危機，國家在經濟政策上，提出了金融服務業的「亞太營運中心」；設立多處科學園區、大量釋放國有地等手段以吸引國際和國內企業的投資（王振寰，1997：25）。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台北也開始轉型成為一種由民間資金主導都市發展的企業城市。1980年代以後，製造業逐漸下滑，而生產者服務業則大幅成長（林德福，2003；金家禾，1999）。當時，在市政府的規劃引導與規劃之下，1990年之後將台灣企業總部、科技產業、生產者服務業與媒體文化創意產業進一步匯集到台北東區至基隆路附近區域，同時市政府也積極推動「經貿科學園區」、「信義計畫區」、「首都核心區」、以及「西區再造」等方案（周志龍，2003）。想要為台北形塑「世界城市」的形象，政府更結合了財團的資金，在信義區興建了台北 101 大樓，試圖將信義區打造成「台北曼哈頓」（周素卿，2003）⁶。

總結來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在不同的殖民關係下，台北的發展始終和世界經濟息息相關。在清帝國的殖民下以大稻埕為中心和國際市場接軌；在日本殖民時期則是以台北市為中心透過日本作為轉運站間接和世界市場貿易；1960年代以後戰後則在國民黨的高壓統治下，成為全台出口經濟的中心；及至 1980 年代末期，台北在政治上進入後殖民，但是在經濟上則以企業城市的姿態，投入世界性的城市競爭過程之中；這些彼此競逐的城市中，也包括了香港。

（二）殖民主義與世界經濟脈絡下的香港

1842 年鴉片戰爭後，清朝和英國簽定《南京條約》正式割讓香港島。在英國統治之後至 1997 年這段期間，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被建構成一個由英國統治、但是以華人為主體的自由港，它成為國際商品、資金與人口出入中國的主要窗口（陳介英，1997）。⁷ 1937 年中國對日戰爭爆發，讓許

⁶ 近日台北市政府為了打造「台北六本木」而拆除華光社區，則是另一個例子。

⁷ 舉例來說，從 1856 年以後，中國四分之一的進口貨和三分之一的出口貨都由香港周轉資金並在香港進行分配，大多數外商都在香港設置總部，從香港指揮其對中國及他處的貿易業務（余繩武、劉存寬，1994）。除了商品與資金的進出之外，這個時期也是華工經由香港進出到世界各地的高峰時期。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帝國殖民主義的擴張造成大量的人力需求，如西印度群島的棉花、蔗糖農場以及美國西部、加拿大和澳洲的開墾和鐵路建造等都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因此吸引了許多中國對外大量的移民。根據統計，1851 年到 1900 年的半個世紀中，就有兩百萬以上的廣東人和福建人經由香港移民到海外。而香港的中外商人，因移民事業取得了大量利潤，而海外華僑的衣物與日用品也透過香港這邊大量供應（蔡榮芳，2001）。

多華資企業紛紛遷移到香港，帶來另一波新的資金和技術人才的投入，香港工業因而得到了某個程度的發展，但是實際上到了 1950 年代工業部門才迅速發展。到 1950 年代，因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共產主義國家實質圍堵政策，導致香港無法再依賴對中國的轉口貿易，於是自 1950 年代中期後，香港企業界便改以紡織和成衣等輕工業為首，帶動了本地工業部門的成長（劉鑒如，1993）。

在 1950 年代到 1970 代之間，香港雖以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帶動了經濟快速成長，但在社會上卻造成了財富分配極度不均的問題。大部分的民眾必須忍受長時間勞動、居住在條件惡劣的生活環境、缺乏足夠的醫療與教育等社會服務，造成了民眾心理上長期的不滿。結果，1967 年在中國左派的介入下，人民的不滿終於引發了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六七暴動」。在暴動平息後，殖民地政府為了維持社會穩定，開始改革社會制度，將英國當時工黨執政所施實的福利國家政策引入，並和本地人民建立新的社會契約，確保勞工一定的生活品質，最重要的措施包括十年建屋計畫、九年免費教育、綜援制度、社區發展、廉政公署、新市鎮規劃等（孔誥烽，2009）。雖然殖民地政府表面上仍主張放任的自由主義，提出「積極的不干涉主義」，但實際上卻仍摻雜了在殖民母國實施的凱恩斯福利國家的元素。

從 1970 年到 1980 年之間，香港不管在經濟和社會面都大致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然而，在 1970 末年全球經濟又開始了另一波重大的變局，也就是 1979 年中國開始進行所謂「改革開放」，中國開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而香港首當其衝。經濟開放對香港最立即的衝擊就是製造業的北移，特別是移到勞動成本遠低於香港的廣東、福建一帶，造成香港製造業「空洞化」的危機。面對這波產業危機，港英政府試圖以兩個策略來化解：首先，它利用地緣的鄰近性以及語言與文化上的共通性等優勢，將自己建構為港資與台資在中國生產基地的管控中心；其次，香港藉由引入國際性金融業與生產者服務業讓自己成為區域性的金融中心。事實上，香港也是中國企業投資最重要的集資地，上述兩個城市發展策略顯然取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也使香港能從 1980 年代以後便位居東亞重要的國際城市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政府公共支出大量減縮，放手由民開企業去開發（尤其是房地產業），香港漸漸地由一個不明說的凱恩斯福利型城市轉向明說的熊彼德企業型城市（Jessop & Sum, 2000）。

1997 年香港移交中國，香港進入了後殖民時代，但接手的香港特區政府依舊本著企業型城市的治理策略，企圖提升香港全球城市競爭力，並將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及「中國主要城市」（藍逸之，2011, p. 228）。

「亞洲國際都會」是為吸引跨國資本，讓香港在全球城市位階的競賽中維持競爭力。為了維持這個地位，在都市地景中藉由各種奇觀的大型計畫來打造特殊的意象，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了觀塘市中心重建、數碼港計劃、西九龍文娛藝術區及中環新海濱城市設計等。至於在「中國主要城市」的定位方面，2003 年後香港特區政府與中國內地先後簽訂《CEPA》及《泛珠江三角洲區域合作》等條約，意圖使香港與珠三角成為跨境全球城市區域，使香港的服務業與中國內地的製造業形成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港珠澳大橋及廣深港高速鐵路的興建，即為香港和中國接軌的重大建設。

從前文的簡要歷史回顧可知，放在殖民全球化的脈絡下來看，香港早在 1842 年就已經是一個世界城市，除了冷戰期間之外，香港始終是介於中國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轉口中心。而在 1997 年後殖民時代後，它仍然是世界經濟網絡中的一個重要的節點。

（三）小結

把台北與香港兩個城市的殖民史放在資本主義擴張的脈絡中來檢視，我們可以發現兩者在命運上有幾個共同點：首先，兩者都從十九世中葉開始，就在世界經濟的貿易體系中扮演了區域中心的角色；第二，兩者都在 1960 年代到 1980 年代之間，由於先進工業國生產網絡的延伸，成為全球性的製造業基地；第三，兩地因在 1980 年後因中共的「改革開放」而面臨了產業外移的危機，也都積極以將自身調整為世界經濟中的服務業中心來因應；第四，兩地都在二十世紀末進入了後殖民時期；最後，兩者在日本或英國殖民以前，有很長的時間的殖民宗主國為清帝國，而被殖民的人口組成則以漢人為主。最後這點有很重要的意義，因為這是中國（無是大清帝國、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宣稱其為台灣或香港為母國的重要歷史依據，而這也使得中國始終是兩地的民族認同政治無法擺脫的參考座標，我們可以在後文中的分析看到。

不同的殖民歷程不但造就了兩地人民在文化經驗上的特殊性，也留下了不同的文化地景。這些文化經驗與文化地景作為全球文化經濟流動的產品，如何成為台北與香港諸社會行動者在後殖民時期認同建構的素材，乃是後文要探討的問題。以下，針對個別城市，本文首先將說明殖民經驗對民族認同的影響。這裡的民族認同特別指的是殖民政府為了遂行統治而推動 Benedict Anderson(1991) 所謂的官方民族主義 (official nationalism)。⁸ 接著，本文將檢驗後殖民時期的國家如何接合殖民地景再現與民族主義的敘事，作為建構正當性認同策略。本文將分析焦點鎖定在國家與民族認同，即

是因為即使在現今去疆域化的政治經濟脈絡中，國家似乎仍欲藉由各種文化遺產的政治來壟斷民族認同 (Appadurai 39)。最後，本文將探究在國家所欲壟斷的民族認同建構之外，社會運動是否也能藉由殖民地景的再現，建構 Catstells 所謂的抵抗性認同，進而形成進步性的計劃性認同。

再現台北殖民地景

(一) 台灣民族認同的建構與重構

在清帝國對台統治時期，「台灣人」這個觀念並不存在，一直要到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的漢人才清楚意識自己是台灣人，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殖民者是一個在文化與語言上和自身明顯不同的外國種族 (荊子馨，2001/2006：115)。然而即使在日本殖民時期，所謂台灣人的內涵也是複雜而矛盾的，這不但和中華意識與日本意識的並存相關，也與當時的社會階級結構相關。根據荊子馨 (2001/2006：112-113) 的分析，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所形成的「新民族主義」，主要是因為台灣社會菁英對其在政治上不平等所遭遇的高度不滿。這些菁英分子曾將改變台灣現狀的可能性寄望於同為漢民族的中國，並期待能重回「祖國」懷抱。但值得注意的是，與其說這種中華意識是一種本質性與全面性的中國認同，毋寧說是一種策略性的選擇。⁸

從 1920 年代開始，日本殖民政府為了對抗這種新興的「新民族主義」，加強對台灣的控制，於是開始進行同化運動。同化可以理解為一種掩飾日本對台殖民政策矛盾的意識形態：殖民者一方面鼓勵台灣人以說日語、模仿日本習俗、尊敬天皇等行為來成為日本人，但是卻拒絕給予台灣人政治代表

⁸ Anderson 認為民族主義乃發源於西歐，因為印刷術普及，而興起的一種社群認同建構的運動。但是歐洲原有的王朝於十九世紀後半葉收編本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成果，轉為正當化其統治的手段，並建立了以民族認同為核心的國家，故稱之為官方民族主義。

⁹ 事實上，即使像蔣渭水這種「祖國派」的知識分子，也體察到台灣作為殖民地的特殊性，承認台灣是介於日本殖民主義與中華民族之間的特殊角色，負有「媒介日華親善的使命」(荊子馨 2001/2006: 114)。而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重點在於，當時台灣的地主階級是殖民經濟主要的受益人，這個階級即使在文化情感上認同中華民族主義，但是卻不願意見到基進或革命的反殖民運動破壞其利益。這也解釋了在 1920 年代發動的台灣議會設治請願運動為何會一方面堅持自主的台灣意識，一方面將這種自主性放在日本帝國的整體框架之中 (同前:125)。

權與經濟地位的提升。在這個階段，日人的文化殖民計劃基本上還是漸近與相對寬容的，而且往往會遷就台灣本地的特殊性。但從 1937 年開始，為了支持日本軍事行動的需求，除了前文所提及的經濟政策改變之外，日人也開始在台灣推動皇民化運動，企圖將台灣人改造為願意為天皇犧牲的日本人。在皇民化運動之下，不但人民被強迫取日本名字、行日本禮儀、說日語，連台灣的傳統寺廟也被摧毀改建神社。被殖民者被迫以行動證明其為「好」日本人，文化同化成為被殖民者提升其政經地位唯一的方式（荊子馨，2001/2006：146-147）。原有的混雜了中華意識與日本意識的台灣人認同被徹底壓抑，台灣人在這個官方的論述下等同於日本人。

1949 年國民黨撤退來台之後，台灣人的認同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複雜。在「反共復國」的總體國家目標之下，國民黨政府開始實施長達四十年的戰時戒嚴法令。為了支持對中共戰爭以及在台統治的正當性，國民政府在行政制度上將台灣視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省份。在文化領域的支配上，則致力於將台灣居民從「日本人」再轉化成「中國人」。在手段上，國民黨的文化政策在某些方面很類似日本的皇民化運動，例如在文化論述強調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的連續性或是儒家的道統，在具體的制度上，台灣當時既有的地方文化，像是台語、民謠、地方藝術、宗教，以及日本殖民時期留下的語言與文化，都在公共領域中被禁止或是被消音（Chun, 1996）。至於在營造環境方面，饒富象徵意義的事件包括許多日本神社被拆除改建為忠烈祠，以及台北的城門在保護修繕後屋頂被改成北方宮殿的式樣。¹⁰ 除此之外，政府並不認為地方建築有任何的文化價值，而任其遭破壞或拆除，例如板橋林家花園在當時就被當成軍隊與難民的收容所，後來更成為違建區。

這個狀況到了 1970 年代開始轉變，由於美國調整了冷戰的防堵政策，開始和北京政府接觸，而聯合國也在 1971 承認為共產黨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失去了聯合國的外交支持，國民黨對不再是中國的合法政權，而其「反共復國」的政治論述也失去了基礎，結果造成國民黨對台統治權的正當性危機。面對這個情勢，國民黨在經濟與文化領域發展出相互支持的策略以便繼續維持其統治權。在經濟上，如前文所述，國民黨政府以開放自由市場、推動出口的經濟政策來改善國內經濟，以發展作為國家的總體標。在文化上，國民黨政府則是逐步地將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論述架構調整為以台灣為中心的文化論述架構。在這個新文化論述的原則下，國民黨開始以「本土化」為號召來收編本地政治異議份子的政治運動。「本土化」運動最具象徵性的行動則是李登輝被蔣經國指定為他的接班人，連蔣經國本人都宣稱自己是台灣人（Chun, 1996）。但是在這個階段，國家仍強調台灣人和中華文化之間的傳承關係，台灣文化仍被視為一個中國地方性文化。¹¹

1987 年的解嚴使得各種原先被壓抑的聲音透過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形式剎時爆發出來，台灣認同正是其中最具爭議的論題之一。面對這個狀況，國家開始試圖要建立一個和「中國人」完全分離的「台灣人」認同。在李登輝就任總統之後，官方的本土化論述的內涵逐漸地由「台灣文化為中國文化的一部份」轉向「台灣文化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文化」，而所謂「台灣人」則由四大族群所組成：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以及外省人。此外，李登輝更從 1993 年起，屢次公開宣稱台灣是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並提倡「台灣人意識」，以及宣揚「生命共同體」的觀念。這種台灣民族認同的重構，一方面是要爭取台灣居民對於國家政權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是要爭取國際社會對台灣政治獨立地位的承認（王振寰、錢永祥，1995）。

從以上一個概要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台灣民族認同發展的曲折過程：從民間形成的中日混合的認同、到了日本強加的日本認同、再到戒嚴前國民黨政府強加的中國認同、最後是解嚴後國家所主導的台灣認同文化論述。這些民族認同，乃是在不同時代被打造的想像社群，然而其想像所形成的力量卻非常巨大；因此，即使曾受到壓抑，這些認同以乎不曾徹底消失，而只是沉澱在社會集體記憶的某處。以下，本文將把焦點放在台北的「首都核心區」計畫，探討後解嚴時期的國家，如何藉由日本殖民時期公共建築物的詮釋與再現，重組城市集體記憶，並將納入其建構正當性認同的計劃之中。

（二）殖民地景再現與正當性認同：「首都核心區」

當國家將傳統地景的保護與經營制度化時，保存對象的選擇本身，便透露了國家意欲藉由地景的再現來彰顯特定的歷史敘事。在解嚴前夕，國民黨政府已經開始進行歷史保存的制度化工作，它在 1981 年成立文化建設委員會（為今文化部前身），並於次年通過的《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稱《文資法》）。對應了當時官方的文化論述，當時國家所重視的傳統建築與地景幾乎都是日本人統治之前所興建，至於日本殖民時代的建築物或遺跡，則完全沒有任何一個被列為古蹟（顏亮一，2005）。但是這個現象在解嚴之後台灣認同重構計劃的脈絡下，開始有了轉變，其中尤以台北市的變化最富戲劇性。

10 唯一的例外是北門，因為原本預定要拆除造路而未進行修繕，結果反而保留了城門原貌，後來更被指定國定古蹟。

11 例如當時文建會主委陳奇祿（1985：4）曾說：「中國人將中國文化…深深地根植在這個島上，因此也建造了很多足以代表中國式樣的建築…要瞭解台灣文化的根，透過這些古蹟可以獲得最深刻的引證。」

1994 年民進黨首度在台北市執政之後，相當重視傳統建築與地景的保存，並將之視為施政的重點。台北市在中央政府原有《文資法》的架構之外，另外制定了台北市單行的歷史保存制度像是「市定古蹟」與「歷史建築」，並積極登錄需被保護的建築物。從數量來看，由中央政府所指定、位於台北市的「國定古蹟」在 1990 年到 2010 年間只增加了九個，但是台北市政府自行指定的「市定古蹟」則增加了 115 個。然而除了數量之外，更具意義的可能是什麼樣的傳統建築物會被指定為古蹟。從表 1 中可以看到，在 1990 年以前並沒有任何日治時期興建的建築物被指定，可是從 1990 年開始，情形就開始轉變，其中尤以 1996 年至 2000 年之間的數量最為顯著。這或許和 1994 年到 1998 年民進黨主政台北有關，但是 1998 年國民黨主政以後，仍然持續有日治時期的建築物被指定為古蹟。此外，國民黨主政的台北市政府還分別在 1999 年與 2004 年舉辦了台北古地圖與古文物的展覽，其中絕大部分的資料都是在日治時期所生產的。¹² 換句話說，在解嚴之後的台北，無論執政者是誰，台北市政府的文化部門對於日本殖民地景都相當重視。

表 1. 台北市古蹟指定型態與年代表 (本文整理自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網站)¹³

		1990 年以前	1990 年-1995 年	1996 年-2000 年	2000 年-2005 年	2005 年-2010 年
國定古蹟	非日治時期	1	0	1	0	0
	日治時期	0	1	7	0	0
市定古蹟	非日治時期	18	1	5	3	3
	日治時期	0	5	53	17	28

對應 1990 年代國家關於台灣「生命共同體」的文化論述，我們可以推論官方歷史保存與台灣民族認同建構計劃之間有一定的相關；至於其具體的

¹² 台北市政府於 1999 年舉辦「城市畫像－台北古地圖展」，於台北市植物園布政使司文物館展出七十餘張 1627 年至 1999 年的古地圖；2004 年則於二二八紀念館舉辦「穿越時光看台北－台北建城 120 週年古地圖、舊影像、文獻文物展」。

¹³ <http://www.boch.gov.tw/boch/frontsite/cultureassets/CultureAssetsTotalSearchAction.do?method=doSearchTotal&menuId=310&iscancel=true>，檢索日期 2013 年 8 月 21 日。

運作機制，我們可以從 1995 年由台北市都市發局推動的「首都核心區」計畫來考察。遠在 1860 年代，清帝國決定在今日的總統府一帶建造台北城。然而日本殖民者來了以後，為了表達其帝國的光榮和力量，殖民政府進行了現代化城市的計畫。1900 年日本政府宣佈了第一次修改的城區規劃，舊台北城有了新的道路規劃及以西方古典風格興建的政府行政大樓。從 1901 到 1904 年台北城的城牆被推倒，只留下四座城門。1919 年台灣總督府興建完成，沿著總督府的道路也隨之完工。當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新的政權接管了該地區政府大樓，台灣總督府被改成總統辦公的地點，在此，「“總督府”被轉化為“總統府”也表徵了權力如何自然化為“新”國家支配台灣社會的神話」(夏鑄九，2000：61)。

市府推動「首都核心區」計畫推動的動機，以當時的都市發展局局長張景森所說的一席話最具代表性：

台北市政府有意揭開總統府周邊博愛特區的嚴肅面紗，使它變得更為親民… 總統府附近地區是台北市的核心，這個核心區是用磚塊及石頭寫成的畫本，記載著台灣近代歷史上統治者的觀念，反映他們的空間美學：在清朝是個迷信色彩的風水城池，日治時期是壯麗威嚴的殖民地巴洛克城市，戰後則是肅殺的軍事戒嚴特區。任何一個人從這個空間讀不到台灣政治、社會、文化及心靈的進步，當然也讀不到統治者對市民的體貼、對歷史人文的關懷、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梦想與承諾。¹⁴

因此，此計畫要保持總統府的建築形式，並重新規劃交通動線和開放空間，讓此公共建築更親近社會大眾，讓市民看到統治者對「台灣未來發展的梦想與承諾」。「首都核心區」面積約為 340 公頃，許多重要的公共建築，如總統府、台北賓館、國父紀念館、台大醫院、二二八紀念公園、台北火車站、北門等，以及許多商店和沿商業街上保存的清代歷史遺跡，都位於此區。在「首都核心區」有數個子計畫，包括登記歷史遺址和歷史建築、改善街道附近的老城門及具有歷史價值的商店、重建此地的商業區、復原國父紀念館前廣場、改善行人系統、以及「府前廣場改造計畫」等。

如果將「首都核心區」這個計畫視為國家藉由傳統地景再現建構民族認同的一種策略的話，那這個計畫中的主角顯然就是日本殖民的地景。這點

¹⁴ 聯合報，1996 年 1 月 20 日，20 版。

可以從張景森對這個核心區的措詞讀出來：這裡在「清朝是個迷信色彩的風水城池」，在戰後則是「肅殺的軍事戒嚴特區」，地景在此都表現了負面的意義，唯獨在「日治時期是壯麗威嚴的殖民地巴洛克城市」，似乎才有正面的意義。而為了去除核心區在國民黨戒嚴時期的所代表的監禁意義，市府更高調推動「府前廣場改造計畫」，目標就是要把這個空間「還給人民」。市府在 1995 年委託淡江大學建築系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合作進行規劃，在 1996 年舉辦了「總統府前廣規劃構想規劃徵圖」的活動，並從一九九件作品中選出了十六個理想構想。另一方面，為了宣示「空間解嚴」，市府也在 1995 年於府前廣場舉辦舞會的活動，而介壽路則在 1996 年被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整個計畫的高潮乃是 2000 年十二月市政府發起了一個國際性的重建規劃提案比賽，在比賽宣布後，收到五十五個國內外的設計提案，結果則於 2001 年七月公布。¹⁵ 有趣的是，優勝的作品共同的特點在於它們都在保留老歷史建築之外，增加了新的高科技建築；而三件作品都以開放以及民主呼應競圖主題「透明」，這也隱約說明了國家在重塑這個最具政治意義的公共空間時，同時關注了在地的殖民記憶以及普世的民主價值。

儘管在競圖結束之後，「府前廣場改造計畫」最終並未付諸實行，「首都核心區」計畫仍可說是國家重塑台灣民族認同最重要的文化策略之一。藉由保護日本殖民地景、改變道路命名以及首都廣場競圖等方案，國家企圖以一種結合各時期殖民文化的論述來呼應新台灣民族認同的建構計劃。在這裡出現了一個有趣的問題：日本殖民地景為何以及如何成為台北後殖民時期國家建構正當性認同的元素？當我們想到韓國於 1995 年在金永三政府的主導下年拆除了位於景福宮內的朝鮮總督府，似乎要以將殖民的痕跡從都市地景上完全抹除的方式來喚回民族正統性時（夏鑄九：2000：60），台北的經驗更形弔詭。

要理這個弔詭的現象，我們必須將台灣認同放入解嚴後中國和台灣的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脈絡來考量。誠如 Joseph Allen (2012) 所指出，台灣在建立新的民族認同時，一方面要抗拒中共「民族統一」與美國「一個中國」政策下的民族主義，二方面則要抗拒戒嚴時期國民黨所建立的中國認同，在這個情境下，包括原住民、西荷時期、清帝國時期、日本殖民時期、以及當

15 得獎作品三名並列，其中荻原剛 (Takashi Hagiwara) 的作品「多元與開放」以錯置的小公園與廣場來象徵民主的價值；長谷川逸子 (Itsudo Hasegawa) 的作品「台灣的空隙」提出了一個「綠色廣場」的概念，將整個基地變成綠地公園；而皮西亞 (Andres Perea) 的作品「鳥瞰」則設計了一個「地下樂園」，在廣場下面則提供了一個立體的山水樂園，與地面上嚴肅的殖民帝國主義風格的總督府建築形成明顯的對照。

代各種「多元文化」以及「民主」之文化再現被召喚出來，用來作為建構新自主的台灣認同之文化構件。本文認為，從這個脈絡下來理解台北市對於日本殖民地景的保存與再現，我們較能恰如其分地解讀其意義：保存日本殖民地景並非將台灣認同投射在過去或現在的日本，而是利用殖民地景作為文化象徵，用來抵抗當代中共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威脅，或至少作為一種在民族身分上的區別。因此在「首都核心區」中，日本殖民建築在迴避其原始壓迫的意義下被轉化為台灣的反（國民黨威權）殖民建築。

儘管如此，並非所有的殖民地景都受到國家的重視，當殖民地景妨礙了經濟發展下的都市空間重構時，往往遭受拆除的命運，除非有社會運動的力量與之抗衡。以下要討論的樂生療養院（以下簡稱樂生院）就是這樣的例子。

（三）殖民地景再現與抵抗性認同：樂生院保存運動

樂生院於 1930 年創立於新莊頂坡角，也就是在今天新莊區迴龍一帶，是一個收容漢生病患的療養院所。由於漢生病在當時仍是一種無法治癒、而且原因不明的傳染病，因此日本殖民政府醫療體系的作法乃是將病患徹底地與社會隔絕。新莊地區在當時是以生產稻米為主的農業地帶，人口密度不高；頂坡角又離新莊老街有一段距離，因此樂生院的區位的確達成了隔離的目的。到了 1950 年代，出現了治療漢生病的特效藥物，而醫學界也發現漢生病其實傳染力極低，因此就停止了隔離政策。但是院民因為長期遭受外界歧視，又已經習慣院內的生活環境，也就以院為家，並且形成了一個內聚力很強的社區（陳歆怡，2006）。

1994 年，為了興建捷運新莊線，交通部出面與樂生院主管機關省衛生處進行樂生院用地協商，在「有償撥用、就近安置、先建後拆」等原則之下，將樂生院指定為捷運機廠用地。在規劃與設計過程中，樂生院民雖然曾向法院表達反對拆遷樂生院的計畫，但最後在院方的勸說之下不了了之。但是當機廠在 2002 年開始動工之後，卻引發了一連串的保存運動。2004 年三月一群關心樂生院民的學生成立了「青年樂生聯盟」（以下簡稱「樂青」），協助院民向相關單位陳情，提出了四大訴求：「確保院民人權，反對強迫搬遷；尊重專業審查，完成古蹟指定；院區原地保存，捷運古蹟共構；成立專案小組，捷運暫緩施工」。然而政府卻以保存院區將造成捷運無法如期通車為由，拒絕院民的訴求。之後，樂生院民也在 2005 年三月化被動為主動，成立了「樂生保留自救會」（以下簡稱「自救會」）。

就在保存團體與官方形成對峙之際，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在 2004 年，曾協助日本漢生病患打贏國賠訴訟的律師久保井攝在受理訴訟期間，發現台灣還有一個收容戰前病患的療養院，便來台了解。經調查後，樂生院內有二十五名院民符合求償資格，於是便代他們向日本政府求償。結果在 2005 年 10 月 25 日，東京地方法以「台灣的療養院確實屬於國立療養院」為由，判決日本政府要補償台灣病患。此舉無異是由國際性的觀點間接地肯定了樂生院民居留原地的權利，這個情勢自然給政府帶來了一定程度的壓力。結果，文建會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終於在 12 月 11 日將樂生院指定為「暫定古蹟」，依法在六個月內不得破壞，暫緩了樂生拆除的危機。

面對這個情勢，捷運局在 2006 年二月提出了「樂生院 41% 保存方案」，但是不被保存團體所接受。到了 2007 年一月，文建會則委託英國欣陸工程顧問公司研究，提出了「90% 保存方案」，然而行政院卻表態支持「41% 保存方案」。到了 5 月 30 日，行政院工程會召開「樂生保留方案評估」結案會議，在院民與保存團體的退席抗議下，決議採用「41% 保存方案」，並要所有院民必須搬遷。之後，台北縣政府遂於 2008 年十二月開始了拆除工作，最後只保留了三十九棟建築，而部分主體建築則採先拆除，預定於機廠完工後再於原地重組。

長達四年的樂生保存運動，雖然僅保有部分實質空間，但更重要的是，在保存運動者的努力下，樂生院浮現並留存於市民大眾的空間認知之中，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例子來觀察。從 2005 年開始，樂生保存運動持續不斷地有藝文團體投入，試圖以藝術交流的方式，一方面翻轉外界對漢生病的負面印象，另一方面則凝結樂生院民的感情與鬥志。歷年來在樂生院舉辦的藝術活動包括了「樂生影展」、「生命、音樂、大樹下」、「理想藝術節」、「樂生那卡西」等，這些活動將樂生院轉變成一個「不同世代與團體交流的藝術場域」（陳佳利，2010，313）。其中「樂生那卡西」更是由藝術工作者與樂生院民共同作詞作曲，並製作成「被遺忘的國寶」專輯。參與創作不但讓使院民「從傳統病患的被動形象，轉變成為具主動創作力的藝術家」（同前）。事實上，樂青與院民長期以樂生院作為活動基地，並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對外界發聲，對於轉變大眾對樂生院的觀感有很大的作用。

其次，從 2007 年夏天，部分樂青成員開始推動成立「樂生博物故事館」，並於當年十二月十二日開幕。「樂生博物故事館」利用當時尚未被拆遷的王字型建築（即主要的行政與醫療院所）作為展場，主要以物件、相片與文字等方式展示院民的日常活以及保存運動。一開始，院民並不認同博物館的設立，因為博物館「隱含對保存運動的一種退讓與否定，似乎唯

有即將消逝的文化與主體，才會迫切地採取博物館的保存策略」(陳佳利，2010，299)。然而，當博物館成立之後，院民卻不時主動擔任導覽工作，和參訪者分享自身的歷史。藉著回憶、分享控訴公部門不人道的對待，博物館成為部份院民獲得心靈慰藉的一種方式。然而，博物館的建立更大的意義在於將一直被隔離的樂生院，轉型成對公眾展示與解說的教育空間，引發大眾對於漢生病患人權的關注。

除了博物館的建立外，「樂青」也在2007年夏天開辦了「樂生社區學校」，一方面提供附近居民公共活動的空間，另一方面則「將『無用的大學生』之社會位置在此情境下轉變成為『社區老師』，『賴著不走的患者』轉成『樂生院的阿公阿媽』」(姚耀婷，2010，126)，進而改變居民對樂生院的刻板印象，甚至進一步願意主動使用這個空間、參與樂生文化園區的設計規劃。「樂生社區學校」由來自北區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義務擔任課程老師，發揮自己的所學專長，開設各種才藝課程，到2010年為止，總共舉辦了六屆，由於課程多元、收費低廉，廣受附近社區居民歡迎，據估計有三百個以上的學童參加過學校的課程。¹⁶雖然從2010年秋天，由於捷運的施工，使得上課使用的房舍出現許多裂痕，顯示出地層已經在滑動，造成安全上問題，因此社區學校不得不停止招生。但社區學校的確拉近了樂生院民與周邊社區民眾的關係。例如2008年十二月樂生開始拆除前夕，社區學校的家長還曾連署陳情。而樂生社區學校的學生、家長與工作人員在停招後仍組成了一個工作團隊，定期造訪院民，並不定期舉辦社區活動。

對照類似「首都核心區」這種由國家所啟動的殖民地景再現計劃，樂生院保存運動說明的是社會運動藉由重新詮釋與再現殖民地景以建立抵抗性認同的過程。樂生院長期處於地理與社會的邊緣，卻因為都市的開發而「被看見」。但是這種「被看見」並非自然發生的，而是社會運動爭取而來的。首先，保存運動廣泛地運用相關各種文化素材來對樂生院地景進行詮釋，包括了殖民時期的公衛史、作為地方文化的建築形式、漢生病患的人權等，並以之形成受迫者組織認同的論述基礎。其次，保存運動也善用了全球化時代的網絡力量，例如帶院民到日本打官司、委託英國工程顧問公司提對案等。最後，經由無數次街頭抗爭、各種藝文活動、成立「樂生博物故事館」與「樂生社區學校」等方式，保存運動促使一般市民大眾正視弱勢者的文化與人權，並重省都市社會正義的課題。

¹⁶ 「樂生社區學校」的課程可參考 <http://loshengschool.blogspot.tw/search/label/社區學校課程> (檢索日期：2013年1月23日)

再現香港殖民地景

(一) 香港民族認同的建構與重構

雖然香港所經歷的殖民政權只有清帝國以及英國，但是其民族認同問題的複雜性比起台北則不遑多讓。在英國人統治香港初期，採取隔英華隔離政策，英人用英式法律管理，華人則用中式法律管理。從1842年到1949年間，由於殖民政府視香港為一自由港，香港與中國大陸之間並沒有人口流動的管制，因此香港成為中國大陸人的在辛亥革命、日本侵華、共產黨革命等重大政治事件的避難所（李植悅，2009）。在1949年之前，由於殖民政府既未刻意打造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而大部分香港居民又只將香港視為暫居之地，因此香港華人在民族身分上基本上仍視自己為中國人（葉建源，2009：64）。然而自1949年之後，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共產世界的圍堵，殖民政府開始立法管制華人的出入境自由，區分出合法與非法移民，這也使得「香港人」的身分首次和中國人區分開來（谷叔美，2009）。¹⁷

除了在法律制度上對香港人的身分認定，港英政府的教育制度也對香港的民族認同有重大的影響。在二次大戰以前，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依附於中國的教育體系之內，然而這層關係在1949年之後則被切斷。在反共的冷戰氣氛下，香港的中小學教育對於中國的內容採取「一分為二」的手法：對於古典的中國哲學、歷史、文學、藝術等採取寬容甚至鼓勵的態度，但現代或當代中國的內容，則完全被排除在學校的正規課程之外。這個作法一方面符合了逃避共產黨而來的文化仍傳承中華文化的心態，二方面由於迴避對當代中國的討論，也不致於得罪北京政府。另一方面，和大部分殖民地政府類似，港英政府也刻意培養一批理解英國文化的「高級華人」，協助其進行香港的治理，這更進一步使得中文與中國文化的教學不斷地式微。這種教育制度的結果是香港青年對於中國民族身分的日漸疏離（葉建源，2009：66-67）。

另一方面，以香港工會聯合會為首的親中左派團體，則以「新中國一反帝主義—社會主義」和「香港—英帝國主義—資本主義」這個對立邏輯，試圖在香港建立一種新的身分認同（盧思騁，1997：44）。這個運動結合了中國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最終導至了「六七暴動」的發生。「暴動」雖

¹⁷ 1980年以前，基於人道主義與不危害香港經濟利益的原則下，港府對於大陸來港非法移民採取寬容政策。然而自1980年以後，在人口壓力之下，港府不再給予非法移民居留權（谷叔美，2009）。

隨著港英政府的武力鎮壓而平息，香港市民對於殖民政府的不滿卻日益高漲，其中由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組織發起的「中文運動」，標舉了「尊重母語」、「中國人用中文」等口號，同時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言。這個運動得到許多迴響，最後促使香港政府在 1974 年通過《法定語文條例》，宣佈中文和英文同為香港法定語文。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中文運動」和台灣在日治時期所發展的「新民族主義」類似，表面上似乎是一種對中華民族認同的投射，但是實際上「中國人」在此只是一個抽象的符號，並未扣連上具體的國家政權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盧思騁，1997，48）。換句話說，「中文運動」雖然是一個反殖民的政治運動，但已脫離了早期工會的民族主義傾向，大部分運動份子體認到殖民政治的現實，因而轉而要求香港政府進行社會、經濟、政治和各方面的改革，非推翻現有殖民政權。

誠如前文所提及，殖民政府在 1967 年之後開始以改革社會制度，引入福利國家政策來回應反殖民運動後期的訴求。這些舉措相當程度緩和了反殖民的情緒，香港人的身分問題在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之下，暫時被擱置一旁。誠如呂大樂 (1997:13-14) 所觀察：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社會民情的最大特點，就是市民開始重新理解殖民統治的內容。以前殖民統治等於政治封閉、社會不平等、政府缺乏民間觸覺、脫離群眾、貪污。然而，在七十年代中期開始發展出來的一種看法，是殖民地統治；繼續封閉，但政府會做門面的諮詢與交代的工作，社會不平等，但這個政府能促進香港經濟繁榮；缺乏民間觸覺，但它離開了貪污時代，逐漸走上制度化的軌道…在民眾中，香港成為了高效率、有能力保持經濟繁榮、相對清廉的殖民地。從這個角度來看，殖民地本來的含意也就漸漸淡化了。

直到 1984 年中國和英國簽署了《中英聯合聲明》，在沒有港人參與的狀況下開始會談香港在九七之後的移交事宜，香港人身分才再度成為一個社會關注的議題。法律上，在「一國兩制」的架構下，依照《基本法》香港人取得了「香港永久居民」這個不同於「中國人」的公民身分。然而就民族作為「想像的社群」這種文化的意義上，香港人的認同乃充滿高度的不確定性。Ackbar Abbas(1997) 認為九七前的香港是一個構築在「消失空間」(space of disappearance) 的城市。對 Abbas 而言，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 1997 年後的消失，殖民空間消失帶給港人的非但不是身分認同的重建，反而是消失，這是因為香港人既不再是政治上的「英國子民」，也對於成為政治上的「中國人」滿懷焦慮與恐懼。對於即將接收香港的北京政而言，香港認同自然等同於中國認同。因此，北京政府從移交之前就透過駐港內地官

員與親中的基層團體擴大其影響力，推動「愛國」的國民教育，提高中國民族意識。移交之後，除了推動母語教育之外，特區政府更展開大規模的「愛國」教育工程，包括 1999 年將民族主義納入教育目標、2004 年要求公立學校增設升旗儀式、成立「國民教育專責小組」以推廣愛國教育等（謝昀才，2011）。

香港華人的民族認同從 1949 年的中國人認同，到冷戰期間民間混雜而曖昧不明的中英認同，最後是後殖民時期，官方所要重建的中國認同。和台北一樣，這些民族認同，乃是在不同殖民情態中所被打造的想像社群，同樣也沉澱在社會集體記憶的某處。我們接著要來分析：後殖民時期的國家，如何藉詮釋與再現清帝國與英帝國的殖民地景，使其成為民族認同敘事的空間註腳。

（二）國家正當性與殖民地景再現

在 1980 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和香港民間似乎都對文化遺產保存沒有太多興趣。這一方面是由於香港居民多為難民和移民，對於香港缺乏歸屬感；二方面則是統治的英國人與在地的菁英與也對本地文化重視（Lu, 2003: 8）。港府雖在 1976 年制定了「古物及古蹟條例」，並成立古物古蹟辦事處（以下簡稱辦事處），正式開始實施文物保護政策；然而，在辦事處成立到 1997 年之前，政府並未編列太多預算在傳統建築的保存上，這又與 1980 年代香港逐漸轉型為企業城市相關。首先，由於從 1980 年代起房地產成了香港經濟發展的支柱，因此老舊街區的開發始終優先於傳統建築的保存；第二，香港的上層階級藉由金融業與生產服務業與全球經濟產生密切關係，而他們多數都在國外有居所，是故並不特別在意在地的環境；第三，港英政府傾向以高科技的超高層大樓（例如香港匯豐銀行）而非傳統殖民建築來表現殖民的權威，因此也不特別重視歷史地景的保存（Cros, 2004: 155-158）。

相較於港英政府，接手統轄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以下簡稱特區政府），對於歷史保存則相當重視，而且對歷史地景的再現主要是強調香港與中國文化上的鏈結，但是在維多利亞港周邊許多帶有殖民風格的公共建築既不可能拆除、也可不能視而不見，這時如何以意義的詮釋來引領視覺的認知則成了一個困難卻重要的任務。以下我們將從兩個官方歷史地景再現場域來說明這個論點。第一個場域是香港歷史博物館，該館的前身是 1962 年成立的香港博物美術館，1975 年香港博物美術館被分為香港藝術館和香港博物館兩個單位，其中的香港博物館於 1998 年遷至尖沙咀新建的大樓，並易名為香港歷史博物館（以下簡稱博物館），而博物館的主體建築部分所展示的是

由 2001 年開始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

「香港故事」的展場結合了歷史實物、二維的影像、以及三維的複製品，再加上各種聲光效果，創造宛若迪士尼樂園的虛擬實境（或者實擬虛境？），讓參訪者體驗歷史的「現場」。這種將博物館與劇場相互結合以吸引觀眾的展示手法，從 1980 年代開始便逐漸在國際上流行（劉妙思、劉仲嚴，2011），固不足奇。真正的重點是它怎麼對香港的學生及觀光客說香港歷史。Tony Bennett(1992: 28) 曾指出十九世紀的藝術博物館發展了一種新的文化技術，使得觀眾不再是以主體的身份觀看，而是以「理想公民」角色的觀看「理想的、文明化的過往。」在一個如 Jean Baudrillard (1981/1998) 所說的擬仿物比實物還真的時代，香港歷史博物館可說是將這種文化技術推到了極致。

展區介紹中寫道：「從四億年前的泥盆紀開始，以 1997 年香港回歸作結，內容務求雅俗共賞，趣味與教育並重。我們殷切期望本展覽能引發大家對香港歷史文化的興趣和反思，誠意邀請你們一起來穿梭這個跨越四億年的歷史文化之旅。」¹⁸ 整個展場分為八個展區，第一個展區為「自然生態環境」，而展館的入口是一個地球儀，「讓參觀者確認中國及香港的位置（標楷體為本文所加）。」¹⁹ 第二個展區是「史前時期的香港」，根據在香港出土的考古文物，建構了一個沙丘的場景。第三個展區名為「歷代發展：從漢至清朝」，其中特別強調新界的鄧族在宋代就已定居香港，而卻未提及同樣在宋代就已經在大澳山海邊生活，以捕漁與曬鹽為生，語言和文化都和漢人相異的蛋族。直到第四區，在「香港的民俗」這個命名之下，蛋族才以「水上人家」的方式被呈現，但是對於蛋族被漢人歧視的歷史則隻字未提。²⁰ 走上二樓則開始了近代的故事，第五區為「鴉片戰爭及香港的割讓」，展館內複製了鴉片戰爭時清兵的防衛碉堡，位於碉堡內的影院，則放映一套闡述中西關係發展及第一次鴉片戰爭始末的影片。第六區是「香港開埠及早年發展」，這個展場是用一條仿古街道，加上聲響的效果來呈現二十世紀初香港的日常生活，但是卻不忘強調孫中山在香港的革命事蹟。第七區為「日佔時期」，重現日軍從 1941 年到 1945 年間佔領香港的情景。最後一區是「現代都市及香港回歸」，前半部是以 1960 到 1970 年代的市街景象為主，後半部則是展示從中英談判到「回歸」的相關文物。

¹⁸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zh_TW/web/mh/exhibition/permanent.html

¹⁹ http://www.lcsd.gov.hk/CE/Museum/History/zh_TW/web/mh/exhibition/gallery01.html

²⁰ 關於大澳蛋族與殖民主義的關係，可參考孔誥烽（1997）。

「香港故事」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首先它是非常以中原漢人中心的，從一開始在史前時代就先定立出香港與中國的關係，到宣稱漢人從宋代以後就在此進行開發，至香港「割讓」，最後再到香港「回歸」，基本上想要呈現的就是個香港由中國手中失而復得的故事。在這個故事中，英國殖民者對這個地方的正面影響（特別是1967年以後的福利國家體制），被輕描淡寫的帶了過去。我們再從地景再現的時期來看，「香港故事」所再現的場景，有超過一半以上是以英國殖民之前的時空為背景，這和展館外處處可見的維多利亞時期殖民建築形成很大的落差。放在後「九七」官方民族認同建構的脈絡中，我們便比較容易理解「香港故事」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呈現：特區政府既然無法不讓人看不到英國留下的殖民地景，於是就利用「虛擬實境」的、娛樂的方式引導人們的注意力，看到它所期望被看到的地景。

第二個官方再現歷史地景的場域是屏山文物徑。屏山文物徑位於新界元朗區屏山鄉，長約1公里，是古物古蹟辦事處轄下六條文物徑中第一條被規劃的。途經包括三座法定古蹟的多座中國傳統建築物，文物徑所彰顯的主題是宋朝就在此定居的鄧氏家族。在古物諮詢委員會建議下，經古物古蹟辦事處和建築署數年籌備安排，屏山文物徑於1993年十二月由當年香港總督彭定康主持開幕，並為香港首條文物徑。文物徑沿線皆設有路標和石刻印記為參訪者引導路線，並設置告示牌幫助說明了解沿途古蹟的背景。作為香港政府在九七前夕全力促成的首條文物徑，這條路徑卻位於遠離當代的市中心的新界，相對地，位於城市中心的中區文物徑反倒是到了1999年之後才設立。從這條文物徑展示的內容及其設立過程，我們似乎再一次看到特區政府企圖：藉由選擇性的地景再現，讓觀者的目光跳過近代地景，直接觸及遠古中國地景，以強化其「香港故事」的說服力。

有意思的是，屏山文物徑路上的十二個文物中有十一個都是英國殖民時期之前興建的中國傳統建築物，唯獨有一個殖民政府於1899年興建的警署佇立在整條文物徑的制高點上。當初在此興建警署是因為中國在1898年租借新界土地給英國之後，屏山鄧族與英軍多次發生暴力抗爭，最後殖民政府便在此建立警署以維持治安。在1965年，元朗分區警署落成啟用，現址又改作警犬隊的總部及訓練中心。從地景上來看，屏山警署正如殖民者居高臨下，監視著屏山文物徑上聚落，殖民與被殖民的關係清楚地呈現在地景之上。如果屏山文物徑想呈現的是一個香港和中國內在關連的故事，屏山警署的存在卻打斷了這個敘事的連貫性。面對這種尷尬的處境，特區政府採取的手段是從改變它的使用方式著手，進而改變它的意義。這座建築物在1997年被改建為屏山鄧族文物館，並兼用作屏山文物徑訪客中心，其中展示的主題為鄧氏宗族的發展與生活，展出物品如賀帳、嬰兒椅、花轎等；至於殖民

過程的衝突、壓制與規訓等歷史，則被刻意淡化，更不用說在工業化時期新界的農民被迫離家到市區工廠工作或是到海外當非法勞工的往事。²¹

事實上，將殖民建築轉成博物館、但又展出與該建築原有壓迫意涵不相干主題的作法，屏山警署並非唯一。例如建於 1840 年代的旗杆屋，原先的用途是英國在香港的軍事總部，後來轉為英軍司令官邸；當英軍在 1984 年撤出之後，它被轉用為中國茶具博物館。又如 1910 年建成的威菲路軍營，自 1983 到 1998 年開始，就被用作香港歷史博物館用作臨時館址。經由整修後，這個軍營目前作為香港文物探知館，展出主題為考古與文物建築。從以上例子可知，九七前後的香港政府固然處心積慮要藉由地景的再現來表達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認同，但是殖民風格的公共建築既不可能拆除、也可不能視而不見，於是它便將原有的殖民建築博物館化，一方面改變建築物原有的殖民意涵，二方面則以文化內容的展出，以視覺來導引參訪者對歷史的認知。在這種新的詮釋之中，不但殖民統治的歷史被淡化，而且中英在十九世紀政治與軍事衝突的過程也完全消失了；觀者的注意力「由時而衝突的香港殖民史轉移到中國文化在殖民建築中和諧地收容」(Abbas, 1997: 68)。

(三) 社會運動與殖民地景再現：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

如果說香港官方對於英國殖民地景的再現採取一種「視而不見」或「不予置評」的態度，那香港的民間歷史保育團體則對於因為都市重建而將被拆除的殖民地景非常的重視。的確，在九七之前，香港民間對於歷史保存的重視僅限於文化界，但是在九七之後，城市歷史性地景的保存卻逐漸成為廣為市民大眾所關注的社會議題。²² 本文以下將以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保存運動來說明殖民地景如何成為抵抗性社會運動的核心。

天星碼頭與皇后碼其實乃是中環愛丁堡廣場的兩個渡輪碼頭，隨著中環的填海造陸，兩個碼頭都經歷兩度搬遷，而在 2006 年拆遷前的碼頭則是建於 1958 年，其中天星碼頭的鐘樓更是中環著名的地標。天星碼頭及皇后碼頭保存事件的發生，是因為香港政府開始進行中區填海第三期工程項目，準備將兩個碼頭拆卸作道路和商業用途。2006 年 7 月，一個網路媒體《思

²¹ 關於新界農民從戰前到戰後的生活史，可以參考張少強(2011)的研究。

²² 例如 2004 年開始的反灣仔利東街拆除運動、2009 年的反廣州深圳香港高鐵運動、以及本段要討論的天星、皇后碼頭保留運動。

網絡》刊登了一個關於天星鐘樓的歷史報導，隨後該媒體更組織了網路運動，並舉行讓市民參與的工作坊。從八月開始，有一群藝術家與學生開始定期在碼頭廣場聚集，並利用公共藝術來引起大家注意，而一些保育團體如長春社、保護海港協會及保護海港行動組等，亦舉行遊行等活動，並向政府提出保留碼頭的主張。然而，政府反駁指出舊中環天星碼頭只有四十八年歷史，不符合「已到或超過五十年的法定歷史古蹟」的最底門檻，其文物價值不足以被考慮作原址保存。到同年 11 月 11 日渡輪服務的最後一天，由《思網絡》發起的靜坐活動有 15000 人出席（谷淑美，2011：92-93）。12 月 16 日凌晨，大約十多名反對清拆舊中環天星碼頭的市民在碼頭對絕食抗議，儘管如此，香港政府仍然拆除了天星碼頭。

天星碼頭拆除之後，原來參與保存行動的人組成了一個名為「本土行動」的組織，把保留旁邊的皇后碼頭視為行動的主要目標。自從四月底碼頭停用之後，「本土行動」成員二十四小時長駐碼頭，持續舉辦展覽、集會、公共講座、導覽、絕食等抗議行動，討論各種政治議題，包括香港政府諮詢政治、古蹟政策、人權、警察暴力、規劃等（葉蔭聰，2011：127）。在「本土行動」以及其他的社會團體的壓力之下，皇后碼頭在 2007 年 5 月被評為「一級歷史建築」，但是由於它並非「法定古蹟」，政府只承諾將之拆遷重建，而非原地保留。最後，到了拆除前夕的 7 月 27 日，三名「本土行動」的成員宣佈進行無限期靜坐絕食至政府承諾，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為止，然而政府發展局仍於 8 月 1 日拆除了這座碼頭。

儘管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都沒有被保留下來，但是在這兩個事件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到殖民地景的再現，如何成為社會運動在民族的向度之外建立身分認同的策略。雖然這兩個碼頭以及其所在的愛丁堡廣場的空間形式都帶有英國殖民色彩，但是兩個運動所訴諸的「集體回憶」之公共論述所聚焦的並非殖民者的榮光，而是其「本土性、與城市和市民的日常關係。對地標的想像不單止於時間，更有空間、文化和身份認同的面向。」（谷淑美，2011：94）而運動對於身分認同的建構也已經脫離了中國與英國對立的民族國家想像。例如在保存團體對天星碼頭歷史的考掘中發現了一件罕為人知的往事：1966 年 4 月 4 日，有一位名為蘇守忠的市民由於在天星碼頭絕食抗議天星小輪加價而被逮捕，結果引發千人上街，導致後來的「六七暴動」。保存人士將保存的目的扣連上這段歷史，在 2006 年 12 月 6 日發表的「絕食宣言」中寫道：

1966年4月4日，青年蘇守忠在中環天星碼頭上站立，進行絕食抗議；當年他身後的鐘樓行將被殘殺的時候，我們亦絕食了……諷刺的是，蘇守忠當年對抗的是外來殖民政權，我們今天抵抗的，竟然是號稱「港人治港」，自詡「以民為本」的特區政府（葉蔭聰，2011：137）。

換句話說，在保存運動者的詮釋之下，天星碼頭的歷史價值已不完全在於其形式或是生活的地標，而在於彰顯了香港市民爭取平等公民權的社會史。

這種非民族國家認同論述在皇后碼頭的保存運動中得到進一步的延伸。從民族國家認同的角度，皇后碼頭可說是充滿了殖民權力的象徵意味：它是六位港督抵達機場後乘船到香港島的登陸地點，也是殖民地政府迎接英國皇室成員的地點（谷淑美，2011：98）。正因如此，在皇后碼頭保存運動初期，「本土行動」成員內部就曾為是否應該保存一個紀念英國女皇及殖民總督的碼頭。最後在經過討論之後，他們在2007年1月20日舉行了一個很有創意的活動：「一二一人民登陸碼頭」（葉蔭聰，2011：139）。這個活動的參加者約有一百多人，其中除了「本土行動」成員之外，還包括了受影響的居民、保育團體、立法會議員、工人、外藉勞工、爭取居留權人士、學生、獨立媒體、藝術工作者、學者、建築師等（谷淑美，2011：100）。藉由這個具有高度象徵意義活動，保存運動者乃是在承認皇后碼頭過去殖民意義的基礎上，重建這個史跡的當代歷意義：此地過去曾是英國殖民者登陸之處，而在則是「人民」登陸的時候了，而這裡的「人民」不是由民族國家來界定，而是由公民的政治自主權利來界定。

就殖民地景的詮釋與再現上，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保存運動和香港官方在「香港故事」或屏山文物徑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誠如前文所分析，香港官方在建構中國人認同的文化論述下，非常注重前英國殖民建築與地景的再現，極力強調香港與中國的文化關連。而對於英國殖民時期的建築，則傾向以某種「存而不論」的方式來處理，意圖淡化英國殖民的歷史。也因此，當面臨都市開發的壓力時，像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這種位於都市核心的殖民地景是可以隨意抹除的。然而社會運動對於英國殖民地景的「閱讀」顯然和官方不同，在跳脫中國—英國這種二元對立的民族國家論述後，殖民地景的保存象徵的是一個不一樣的香港身分，它所反抗的是在全球化時期資本在城市積累的邏輯，要求的是自由、人權與民主的價值。

記憶場所、殖民地景、與認同建構

前文我們把分別把台北與香港殖民地景的保存，放在一個去疆域的全球化脈絡中作了探討，我們發現殖民地景在兩個城市中的再現，都成了當今全球文化經濟流動過程中，地方意義重建的重要手段。然而我們也看到，由國家啟動的殖民地景保存計畫和因抵抗交通與房地產開發所展開的殖民地景保存運動，對於殖民地景的詮釋與再現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前者指向一種有助於統治正當性的民族身份認同建構，從而營造出一種民族記憶場所；後者則指向一種與普世價值相關的公民身份認同建構，從而營造出一種社會記憶場所。

在台北，我們從「首都核心區」與「府前廣場改造計畫」等個案看到國家營造民族記憶場所的努力。國家從 1990 年代以後，試圖藉由重新詮釋與再現日本殖民地景，以建構一種可以支持甚至強化台灣民族認同的集體想像。正如前文所示，在台灣在 1987 年解嚴前後，國家面對統治正當性的挑戰時，在文化論述上使用了「本土化」的策略，以「新台灣人」等口號重構台灣的官方民族認同，以爭取台灣居民對國家政權的支持。這種新的官方民族認同一方面要和戒嚴時期所建立的中國認同切割，另一方面又要和當下中共「一個中國」的中國認同區隔，因此其論述內容就從台灣複雜的殖民過程中取材，從原住民到現今的國際移工等「多元文化」被重組成一種新的社群想像。在這種民族認同建構的脈絡下，「首都核心區」的日本殖民地景在國家的重新詮釋以及對空間重新使用下，不僅褪去了日本殖民與國民黨專制雙重壓迫的象徵意義，某個程度還收編了台灣戒嚴期間民主運動的空間記憶，將「首都核心區」詮釋為象徵了普世價值的市民空間。

在香港，我們看到另一種營造民族記憶場所的策略。我們從香港歷史博物館的「香港故事」展以及屏山文徑等個案中看到，國家如何在 1990 年代以後，試圖藉由重新詮釋與再現英國殖民地景，以建構一種可以支持甚至強化中國民族認同的集體想像。從 1984 年中英會談以後，北京政府就開始藉由各種方式，對港人進行「愛國教育」，試圖在英國人離開後重構香港的官方民族認同：香港人即中國人。但是，由於北京政府對於香港政府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在官方在詮釋與再現英國殖民地景的方式就和台北有很大差別；如果說台北官方對於其殖民過程中各種文化印記給予同樣的地位，那香港官方則是極盡全力地強調中國文化對香港的影響。在「香港故事」的虛擬空間中，英國殖民地景的展示只佔了一小部分，而與中國文化相關的地景才是故事主要的場景。而在屏山文物徑則是在遠離都市中心的實體空間中，以漢人早期的聚落的再現來彰顯中港之間的文化的連續性。而文物徑中唯一的英國殖民建築則在使用上被改為屏山文物館，其殖民的壓迫歷史既未被討論，也未被呈現。

比較台北和香港兩地官方對殖民地景的保存策略，可以看到兩地政府雖然都將其視為建構正當性認同的一個手段，但是由於在全球文化經濟景觀中所處的地勢不同，特別是殖民以及去殖民的過程不同，因此在歷史保存這個文化治

理領域上選用的文化素材也有所差異。台灣在政治上的解嚴，是民間長期進行社會與政治上的去（國民黨）殖民所獲得的成果，再加上「中國人」乃是在戒嚴時期支持國家的官方文化認同，因此台北在後殖民時代國家歷史地景再現偏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建築物。它似乎是希望藉由「看見」日本殖民地景來提醒與反思各階段殖民史，並藉以理解台灣民族認同的內涵。至於香港，其去殖民並非由民間爭取得來的，而是一種不同統治者之間的權力移轉，再加上後殖民時期政治主權受到中國很大的影響，因此歷史地景的再現偏重前英國殖民時期的中國傳統建築，而要達成這個目標，它要設法讓人「看不見」英國殖民建築，並遺忘英國的殖民歷史。

然而我們也觀察到，中國從 1980 年代開始進行「改革開放」，吸引了台港兩地製造業分別大量地「西進」與「北進」，造成經濟發展的危機，也對國家統治的正當性造成另一種威脅。面對這種威脅，台北和香港政府從 1990 年代起都採取了企業型城市的治理策略，並急於爭取亞太地區金融與生產者服務業中心的地位；在這個情況下，房地產開發的邏輯主導了城市規劃。結果，當未被官方納入認同建構計畫的殖民地景和新的城市建設計畫發生衝突時，政府往往與開發集團結盟，而任由舊地景被抹除。但是，特別是在 2000 年以後，這類開發計畫經常引發要求保留殖民地景的社會抗爭，而它們界定的身份認同則往往從人權、平等、正義等價值相關。誠如 Hayden (1995: 12) 所言：「具社會包容性的都市地景史可成為公共史與都市保存新研究方法的基礎…這會是一種同時承認城市社會差異性以及空間社區用途的都市設計，這和那種由紀念性建築形式所主導或者由房地產投機所帶動的都市設計有天壤之別。」樂生院、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保留運動正是這樣的例子。

從樂生院的保存運動中，我們看到這個在日本殖民時期建立、非常有壓迫性的監禁場所，如何在保存運動的過程中，轉化一個彰顯弱勢族群文化與人權的社會記憶場所。由於國家對樂生院視而不見，因此才會將之規劃為捷運維修機廠的用地。然而，在「樂青」與「自救會」鏗而不捨的努力下，終究保留了 40 % 的院區。在面對國家強力主導的重大建設論述之下，樂生保存運動的文化與人權論述仍召喚了許多藝術工作者、學者、青年學生的參與；此外，保存運動亦動員善用網絡社會的特性，動員了許多國際性的力量，對保存運動作出了直接或間接的貢獻。樂生院殖民地景在興建當時的所蘊涵的壓迫意義，先是在院民長期的居住下被轉化為一種「家」的意義；到了保存運動展開之後，藉由「正視」樂生院的地景，樂生院的空間則不但成為院民抵抗壓迫的基地，其地景也成為他們賴以建構抵抗性認同的視覺符號。

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的保存運動同樣是一種「正視」殖民地景的社會行動。儘管兩個碼頭最後都被政府拆除，但是保存過程卻引發了許多人對香港文化以及香港人身份的反思。和樂生院類似，保存運動對於這兩個殖民地景的詮釋，跳脫了民族認同的框架，試圖將其視覺意象連結到受迫者的生活經驗。在天星碼頭的個案中，保存運動者藉由發現未被官方記錄的絕食抗議事件，將天星碼

頭視為香港社會運動的一個紀念場所；而在皇后碼頭的個案中，保存運動者則是藉由人民「登陸碼頭」的行動，一方面承認了英國殖民統治的過往，二方面則象徵它的確是過往，而今天的統治應該由包含了各種身份認同的香港人民來接手，而非由特區政府所獨斷。由此觀之，天星與皇后兩碼頭的保存運動也可以視為香港人民在建構抵抗性認同之下的一種社會動員。

我們若把香港與台北並置就會發現，就某個程度而言，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保存運動對英國殖民地景的「正視」以乎可以類比於台北官方對日本殖民的「正視」。的確，從兩個社會行動對於前殖民地景的詮釋與再現看來，兩者都面對了殖民地景過去在政治上的壓迫意涵，也試圖運用了現代政治普世價值的論述來改寫殖民地景的意義。不過本研究要指出的是，這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本的差異，最主要是香港的保存運動是在營造社會記憶場所的前提下再現殖民地景，而台北官方是在營造民族記憶場所的前提下再現殖民地景；前者「正視」殖民地景是為了挑戰國家對社會的支配，而後者「正視」殖民地景倒像是為了收編社會運動的成果，結果這種將殖民空間轉化為市民空間的提法，只會成為一種不實的口惠。各種大小在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抗議行動，從 2006 年的反貪腐的紅衫軍運動，以至於 2013 年要求軍中人權的白衫軍運動，莫不把總統府視為一個壓迫的象徵，這無異是對「首都核心區」計畫中所謂的「空間解嚴」最大的嘲諷。

綜而言之，台北與香港兩地的歷史保存政治說明了，歷史保存成為在地社會利用時間與空間向度的資源，重建文化想像與身份認同的重要方案。台港兩地在某些方面表現了類似的現象。亦即，國家將歷史保存視為建構並壟斷新民族認同的手段，但是社會運動則將歷史保存視為抵抗國家支配、在民族認同之外建構新公民認同的策略。然而，由於位處全球文化經濟景觀的不同地勢，台港兩地對殖民地景的再現策略也相當不同。台北的官方試圖藉由「看見」日本殖民地景來營造民族記憶場所，香港的官方則是以「看不見」英國殖民地景來營造民族記憶場所。相對地，兩地的社會運動都要求官方「看見」保留其「視而不見」的殖民地景，並試圖以之營造社會記憶場所，建構基於公民參與、人權與正義的集體認同。在一個去疆域化的世界裡，這兩種歷史保存方案都可視為不同社會行動者再疆域化的策略，也恆常處於一種緊張的狀態。

結論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探索全球化與後殖民的情境中，台北與香港殖民地景如何被詮釋與再現殖民地景，以支持不同社會行動者身分認同建構的論述。本文將殖民地景的保存，視為在地社會行動者在一個去疆域化的世界中進行再疆域化的行動過程，並藉此探討國家與社會運動，在全球化所產生的文化經濟流動中，選擇了什麼素材，作為詮釋與再現殖民地景的論述基礎。在對台北的「首

都核心區」、「府前廣場改造計畫」、樂生院保存運動，以及香港的香港歷史博物館、屏山文物徑、天星碼頭與皇后碼頭等個案進行分析之後，本文發現，不論是在台北還是香港，由國家啟動的殖民地景保存計畫所營造出來的是一種有助於維持統治正當性民族記憶場所；但是由於位處全球文化經濟景觀的不同地勢，台北的官方試圖藉由彰顯日本殖民地景來營造民族記憶場所，香港的官方則是以淡化英國殖民地景來營造民族記憶場所。相對地，因為抵擋都市開發而形成的殖民地景保存運動，則營造出一種關乎公民參與、人權與正義等集體認同的社會記憶場所。

在本文最後，筆者願意在社會與空間實踐的層次上，提出一點初步的看法。正如本文所討論，全球化下的歷史地景的保存既是可能資本邏輯主導的記憶消費場所，也可能是國家的民族記憶場所，更可以是被支配者或無權勢者所建構的社會記憶場所。站在對抗全球資本與在地國家的立場，Marx 與 Engles 曾呼籲全世界的工人聯合起來對抗資本主義；同樣地，我們或許也可以呼籲台北和香港兩地反資本主義支配、反文化殖民的歷史保存運動者形成跨區域的聯盟，善用共享語言、地理鄰近、與快速資訊流動等優勢，互相支援彼此在地的保存運動。但是要形成這種聯盟，保存運動者首先要拒絕民族國家的誘惑，在認知上超越所謂台灣人、香港人的身分劃分。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從台港兩地歷史保存的社會運動中，我們看到兩者追求的目標其實非常類似。或許就從保存殖民地景開始，我們在未來終可看見一種廣泛、跨區域的新社會運動逐漸形成。

參考文獻

- 1、孔誥烽 (1997) 千年的壓迫、千年的抵抗：殖民主義前後的大澳蛋族，收錄於：羅永生編，誰的城市？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13-140。
- 2、孔誥烽 (2009) 從殖民史尋找未來：香港社會進步與全球戰略價值的殖民地根源，收錄於：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 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127-136。
- 3、王振寰 (1997) 跨國區域經濟形成的統理機制：以台灣資本外移南中國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7：1-36。
- 4、王振寰、錢永祥 (1995) 邁向新國家？民粹威權主義的形成與民主問題，台灣社會研季刊，20：17-55。
- 5、余繩武、劉存寬 (1994) 十九世紀的香港，香港：中華書局。
- 6、李植悅 (2009) 殖民政治文化下的香港身份，收錄於：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 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115-118。
- 7、呂大樂 (1997) 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收錄於：高承恕、陳8、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出版社，115-146。
- 9、谷淑美 (2009) 從移民政策的歷史軌跡看香港身分認同的構成 (1950-80)，收錄於：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 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89-98。
- 10、谷淑美 (2011) 香港城市保育運動的文化政治：歷史、空間、及集體回憶，收錄於：呂大樂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89-103。
- 11、周志龍 (2003) 後工業台北多核心的空間結構化及其治理政治學，地理學報，34：1-18。
- 12、周素卿 (2003) 全球化與新都心的發展：曼哈頓意象下的信義計畫區，地理學報，34，41-60。
- 13、林德福 (2003) 全球經濟中浮現的北台都會區域：後進者全球生產網絡與空間結構轉化之研究 (1980-1990 年代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
- 14、邱貴芬 (1995) 「發現台灣」：建構台灣後殖民論述，收錄於：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
- 15、金家禾 (1999) 邁向世界都市之台北都會區產業結構與空間分佈變遷，都市與計劃，26(2)：95-112。
- 16、姚耀婷 (2010) 重思治理術與日常生活實踐：以樂生 / 新莊對立語境為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所碩士論文。
- 17、荊子馨 (2001)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鄭力軒譯 (2006)，成為日本人：殖民地台灣與認同政治，台北：麥田出版。
- 18、夏鑄九 (1988) 空間形式演變中之依賴與發展：台灣彰化平原的個案，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2/3)：263-338。
- 19、夏鑄九 (2000) 殖民的現代性營造：重寫日本殖民時期台灣建築與城市的歷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40：47-82。
- 20、張少強 (2011) 繪述新界村落的生活世界：土地，發展與歷變，收錄於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新力量網絡編，本土論述 2011：想像新界／本土的性別，台北：漫遊者文化，117-141。
- 21、陳介英 (1997) 來來去去，生生不息—香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成與特質，收錄於：高承恕、陳介玄編，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台北：聯經。
- 22、陳其祿 (1985) 台閩地區古蹟巡禮弁言，收錄於：台閩地區古蹟巡禮，文建會，4-5。
- 23、陳芳明 (2000) 後現代或後殖後：戰後台灣文學史的一個解釋，收錄於：周英雄、劉紀惠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41-64。
- 24、陳佳利 (2010) 身障者之再現與發聲：論「樂生故事博物館」之展示建構，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80：287 - 319。

25、陳清僑作／王景智譯 (1995) 介於殖民與新殖民時期的香港社會，收錄於：26、廖炳惠編，回顧現代文化想像，台北：時報文化，26-35。

27、陳清僑編 (1997)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當代香港文化政治評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8、陳歆怡 (2006) 監獄或家？台灣痲瘋病患者的隔離生涯與自我重建，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9、黃崇憲 (2010) 從開港到加入 WTO：當代台灣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結構轉型，收錄於：黃金麟等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137-170。

30、葉建源 (2009) 英國統治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經驗，收錄於：王慧麟等編，本土論述 2009，台北：漫遊者文化，61-74。

31、葉蔭聰 (2011) 集體行動力與社會運動，收錄於：呂大樂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17-149。

32、廖炳惠 (2000) 台灣：後現代或後殖民？收錄於：周英雄、劉紀惠編，書寫台灣：文學史、後殖民與後現代，台北：麥田出版，85-100。

33、劉妙思、劉仲嚴 (2011) 從博物館劇場學理論探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發展方向，博物館學季刊，25(2)：19-41。

34、劉鑒如 (1993) 戰後香港經濟騰飛之謎，香港：文利出版社。

35、蔡明璋 (2010) 台灣與世界的「接」與「結」的歷史，收錄於黃金麟等編，帝國邊緣：台灣現代性的考察，台北：群學，63-100。

36、蔡榮芳 (2001) 香港人之香港史，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37、盧思騁 (1997) 民族主義與殖民統治：國粹派的民族觀念系統，收錄於：羅永生編，誰的城市：戰後香港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39-68。

38、謝均才 (2011) 學做中國人：後殖民地時代香港國民教育的文化政治，收錄於：呂大樂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1-53。

39、顏亮一 (2005) 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遺產：古蹟保存理論之批判性回顧，地理學報，24：1-24。

40、羅永生編 (1997) 誰的城市？戰後香港的公民文化與政治論述，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41、藍逸之 (2011) 新自由主義下的香港治理：空間、再尺度化與制度策略，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論文。

42、蘇碩斌 (2010) 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台北，台北：群學。

43、鐘聖雄 (2007) 樂生願：漢生病患的家園保衛戰，臺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44、Baudrillard, J. (1981) *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洪玲譯 (1998) 擬仿物與擬像，台北：時報文化。

45、Jeesop, B. (2002) *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 梁書寧譯 (2008)，思索資本主義國家的未來，台北：韋伯文化國際。

46、Marx, K. and Engles, F. (1848),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唐諾譯 (2001)，共產黨宣言，台北：臉譜。

47、Abbas, A. (1997) *Hong Kong: Cultural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48、Allen, J. R. (2012) *Taipei: City of Displacements*,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49、AlSayyad (2004) *The End of Tradition, or the Tradition of Endings?* In Alsayyad, N. (eds.) *The End of Tra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50、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Verso.

50、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51、Boyer, M. C. (1994) *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 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 Cambridge & London: The MIT Press.

52、Boyer, M. C. (1995) The great frame-up: fantastic appearances in contemporary spatial politics. In: Liggett H. and Perry D. C. (eds.) *Spatial Practices: 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Social Spatial Theory*,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81-109.

53、Bennett, T. (1992). Putting policy into cultural studies. In: Grossberg L. et. al. (eds.)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3-37.

54、Castells, M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Cambridge: Blackwell.

Castells, M. (1997).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I: The Power of Identity*. Cambridge: Blackwell.

55、Chun, A. (1996). Discourses of identity in the changing spaces of public culture in Taiwa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3(1): 51-75.

56、Cosgrove, D. E. (1998) *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Madison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57、Cros, H. D. (2004) Postcolonial conflict inherent in the involve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creating new national myths in Hong Kong, In Hall C. M. and Tucker H. (eds.), *Tourism and Postcoloni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53-168.

58、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lated by S. Ra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59、Duncan, J. (1990) *The City as Text: the Politics of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in the Kandyan Kingdo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0、Fraser, Nancy. 1993.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In: Robbins. B. (eds.)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61、Gold, T. B. (1986).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Taiwan Miracle*. Armonk: M.E. Sharpe.

62、Harvey, D. (1982) *The Limit to Capital*, New York: Verso.

63、Harvey, D. (2001a) From managerialism to entrepreneurialism, In: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345-368.

64、Harvey, D. (2001b) The art of rent: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In: *Space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394-411.

65、Hayden, D. (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s as Public History*. Cambridge: MIT Press.

66、Henderson, G. L. (2003) What (else)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andscape: For a return to the social imagination, In Wilson C. and Groth P. (eds.) *Everyday America: Cultural Landscape Studies after J. B. Jackson*,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78-198.

67、Hobsbawn, E. and Ranger, T. (eds.)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8、Jackson, J. B. (1980). *The Necessity for Ruins and Other Topic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69、Jessop, B. and Sum, N. L. (2000) An entrepreneurial city in action: Hong Kong's emerging (inter)urban competition, *Urban Studies*, 37: 2287-2313.
- 70、King A. D. (1990) *Urb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World-Economy: Cultural and Spatial Foundations of the World Urban Syste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71、King, A. D. (1996) Introduction: cities, texts and paradigms, In King, A. D. (eds.) *Representing the City: Ethnicity Capital and Culture in the 21st-Century Metropoli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19.
- 72、Lu, T. L. D. (2003). *The Management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137, pp. 1-27.
- 73、Short, J. R. & Y. H. K. (1999). *Globalization and the City*.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 74、Urry, J. (1990). *The Tourist Gaze: Leisure and Travel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 75、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Cambridge: Blackwell.